

【中东问题】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评析

冯璐璐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属于“援引型”发展模式, 并以民族为基础, 以西方化为中介, 以世俗化为主要表现形式。这种特征是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产生的。土耳其在政治发展上缺乏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政变与反政变活动、政府与传统和宗教势力的冲突时有发生, 在一定范围内还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因此, 虽然土耳其政治现代化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民主化程度也相对提高, 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的阻滞因素, 尤为值得关注。

关键词: 土耳其; 政治现代化; 援引型; 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1-0091-05

Review o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FENG Lu-lu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can be called a development model of introduction, and the chief character of which is secularization. This character is formed by many factors both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is lack of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which also has some potential negative factors be worth noticing such as Islam, conflict and so on.

Key words: Turkey;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 of introduction; secularization

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基本都是回应西方的结果。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回应西方冲击的态度概括为三种: 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凯末尔主义)和改良主义^[1]。基马尔主义则以土耳其为特例。同俄国、日本和大多数中东国家一样, 土耳其最初是受强权刺激而导致政治变迁, 选择的是从西方吸取力量来壮大自己的与其它伊斯兰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正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入侵与强烈刺激, 正是为了反对西方, 土耳其才启动了其现代化进程, 因此有些外国学者称之为“引进型”发展和“防御型”现代化, 以示和欧洲国家由内部滋生现代化因素的类型相区别。土耳其的政治变迁与现代化是以民族为基础、以西方化为中介, 而以世俗化为主要表现形式

的。由于土耳其现代政治体系和传统的政治体系彻底决裂, 而文化上却与传统藕断丝连, 导致其在政治发展上缺乏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政变与反政变活动、政府与传统和宗教势力的冲突时有发生, 在一定范围内还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因此, 虽然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民主化程度也相对提高, 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的阻滞因素, 尤为值得关注。

一、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特征分析

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经历了由以伊斯兰教、世袭制、封建专制为特征的政体向世俗和民主政体的转变, 该过程以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分水岭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由谢里姆三世、麦

收稿日期: 2003-12-10

作者简介: 冯璐璐(1973-), 女, 宁夏盐池人, 西北大学①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伊斯兰教、中东现代化研究。

哈默德二世推动的改革和著名的“坦志麦特”时期,其结果是确立了以西方教育为基础的新型政治科层体系,标志着旧政治结构的瓦解;第二阶段以凯末尔建立民族国家为标志,废除素丹——哈里发制,推行世俗教育,废除伊斯兰教法,表明土耳其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第三阶段是凯末尔之后一直到现在,为多党民主制的发展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时期。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总的特征是“援引型”、西方化与世俗化。如亨廷顿所言,西方文明是最先获得现代性的文明,19世纪日本、中国等一些知识分子就曾断言许多非西方的价值观、伦理观和现代化是相敌对的,要实现现代化就要摒弃传统语言和文化而向西方学习和靠拢。土耳其这种以西方化的方式来实现本国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凯末尔时期最为典型,但前人早已奠定了相当的基础。17世纪早期,奥斯曼人就已经开始讨论如何恢复帝国政治的完整和提高军事效率,复古主义者号召返回到苏莱曼的法典中去,而反对任何屈从于欧洲人和基督徒的变革,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欧洲的军事训练、组织形式和行政有助于建立现代国家,应当加以借鉴。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这两种观点始终进行着激烈的交锋,最终绝大多数倾向于效仿欧洲走西方化的现代化之路。“坦志麦特”时期引进了西方的司法、行政、军事等重要的政治制度,新奥斯曼党人于1876年还引进了第一部宪法,确定以议会两院制为标志的君主立宪制政体,是西方政治体制各种形成因素在土耳其基本定型的重要时段。随着西方制度的进入,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也悄然进入土耳其,许多重要的政治概念被青年土耳其党人以改良主义的方式加以采纳,其中较为典型的人物纳米克·凯末尔和齐亚·帕沙将宗教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分别引进了“国家”、“代议制”政府或“民权”政府、“平等”和“正义”等重要的政治概念。^[2]这些概念的引进没有完全取代伊斯兰教法的相关内容,相反伊斯兰教中的某些理论却极好地佐证了前者存在的合法性,从而使其在土耳其能被广为接受,并为土耳其成功跨入共和国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西方化道路的选择意味着世俗主义从此在土耳其扎下了根,并使土耳其成为走世俗化道路最彻底的中东国家。世俗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现代化基本上产生于西方的同一时期,而土耳其自身的改革为世俗主义的传入和滋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坦志麦特展开的前一百多年里,土耳其人已经在文化和军事领域逐步向世俗化发展。坦志麦特掀起

了第一次世俗化高潮,它从政府分工体制、提高工作效率到法律和教育方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世俗化体系,它对世俗化最明显的突破在于各类世俗法典的引进与世俗法庭的建立。从中可以看出,除了军事以外,土耳其伊斯兰法的不断世俗化也是其政治现代化与世俗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土耳其的法制现代化和世俗化主要体现出法律理念和法源逐渐远离伊斯兰法和统治者意志的束缚,法律体系的划分逐渐趋于精细和完善,西欧法典不断引入并逐渐代替传统法律等特征,这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揭示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中西方化与世俗化的总体属性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最终定型在于对“土耳其”概念的重新界定和民族主义的诞生。长期以来奥斯曼人把他们自身既看作是穆斯林,又看作是素丹的臣民,无法辨别自身代表的是穆斯林的利益还是奥斯曼的利益,而“单词‘土耳其人’只代表的是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流浪汉或乡下佬”^[3]。土耳其民族的概念形成于奥斯曼帝国后期,最初出现的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词汇“Watan”,来表示对穆斯林和帝国的忠诚,当时这一政治术语已具有了一定的民族意义,土耳其民族意识由此被激活。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留学的分子和在伊斯坦布尔避难或学习的中亚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奥斯曼人引进了“土耳其人民”的概念,随后出现了“土耳其祖国”和“土耳其家庭”等俱乐部,这些组织发动“民族”运动来简化土耳其语言,使它更易为大众接受。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言人齐亚·高卡尔普还高度赞扬了土耳其的民间文化,号召要对伊斯兰实行改革,使其能够表达土耳其人的精神。“土耳其民族的概念加强了世俗主义和现代化的趋势,因为它使土耳其在没有危及自身非西方身份的情况下从伊斯兰中分离出来成为可能。”^[3]从1908年起青年土耳其进步联盟委员会领导人就开始设想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从事改革,到1918年军事和政治精英已经将拥有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转变为土耳其民族和世俗国家。凯末尔主义的形成标志着民族主义在土耳其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也标志着世俗主义道路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

二、土耳其政治现代化原因探析

土耳其巨大的政治变迁与现代化是由内外多种因素和条件促成的。从外部来看,土耳其的政治变迁首先源于国际环境的刺激和西方政治压力的推动

作用。奥斯曼帝国是靠战争发展、繁荣起来的,尤其是15~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发展至巅峰,“它的由叶尼舍里步兵和西帕希骑兵组成的军队被认为是无敌的常胜军。”^[4]在这一时期,帝国从未品尝过失败的滋味。然而由于自产业革命以来,欧洲迅速发展,武器创新,技术得到了极大的进步,战斗力大大增强,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严重威胁,而帝国内部危机四伏,军队建设跟不上世界整体发展,致使奥斯曼帝国很快走向解体。1699年签订的卡罗维茨和平协议标志着帝国首次承认战败,并由进攻战略转向保守防御。这次和约连同随后又签订的若干条约使帝国丧失了大片土地,并引起了经济崩溃和危机的全面爆发,更为重要的是古老的伊斯兰传统遭受西方文化的入侵。惨痛的失败使帝国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正是由于发达文明入侵所造成的震荡,才启动了他们的现代化进程。……在与欧洲不断增长的力量相遇时,奥斯曼试图通过引进欧洲的军事训练方法,然后再引进欧洲的公共财政和行政、教育以及立法来使帝国起死回生。”^[5]其次,土耳其的政治变迁是为适应世界范围现代化发展潮流而产生的自然回应。现代化最初兴起于15~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其确立的新政治理念的指引下,英、法等老牌欧洲国家首先开启经济、政治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都获得了较水平的发展。它们的现代化改革理念迅速向世界范围内扩展,在亚洲对现代化的回应虽然稍晚一些,但新观念还是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来,尤其是通过留学人士带回本国。由于最初的现代化改革都针对的是封建体制,土耳其与欧洲各国采取的方式也极为相似,即首先确立新的政治理念。土耳其的政治思想演变经历了泛伊斯兰主义、泛奥斯曼民族主义和凯末尔主义^[2],凯末尔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土耳其政治道路选择的最终完成,它被国外许多学者看作是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新宗教”,对于聚合土耳其民族、巩固其民族认同感具有极大的魅力。

从土耳其政治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精英是其必要条件。西方学者极其重视精英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一国政治趋向于民主还是趋向于民主崩溃完全取决于精英人物偶然作出的选择,这种观点显然过于夸大了个人的作用,但由于精英一般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权威性地位,因而其气质、性格或意愿往往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不管主观上是出于对个人利益还是对整个土耳其政

治前途的考虑,土耳其历史上一些杰出政治人物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抹煞的。当世俗化的改革遭到保守势力反对的时候,往往是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政治人物给予有力的支持,往往是他们用世俗化和现代的术语来论证新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在坦志麦特时期,精英们的意识中首先萌发了有关经济的考虑,到了青年土耳其统治和战争的年代,更是把发展经济作为强化政治的重要战略,同时大批军官控制着政权,他们利用强权和个人影响将自己的价值观施加给其他官员。凯末尔时期依靠大批军官、有经验的行政人员、政治家、律师和知识分子以及由他们发动的民族运动将土耳其建成具有稳固的精英团体和强烈的文化和政治认同感的国家,并促成了民族主义和共和国的诞生。此外,传统势力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抵触情绪也是刺激土耳其政治变迁和世俗化发展的内在因素,素丹和高级乌莱玛为了固守其政治的宗教性和传统性,不惜站在外国侵略者的一边而将枪口对内。“这样,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就在随后发生的民族派和所谓‘哈里发军’之间的激烈内战中,第一次变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6]

三、土耳其政治现代化前景展望

二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民族国家相继独立,中东国家独立体系逐渐形成。随着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扩展,土耳其政治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因,其政治发展不仅要考虑到上述因素,还要考虑到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要求。土耳其于1933年就已正式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1963年开始实施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对产业结构实行改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同时,较为重视商品出口。经过多年的经济现代化实践,土耳其经济获得了较程度的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400美元以上,与上中等收入国家韩国的差距只有一二百美元。原有的生产关系使经济发展出现许多波折和失误,因而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有同样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相配套。此外,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都已发展为超过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使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口结构得到了根本的转变。衣、食、住、行等条件的现代化和教育设施的不断提高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求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并日益演化为社会民主思潮和政治民主潮流,

“由此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权合法性危机”^[7]。这些变因要求土耳其必须加快政治民主化的步伐,进一步完善现代政治体制。

当前,虽然土耳其政治改革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公民参政的机率大大提高,但也应发现尚有许多阻滞因素存在,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伊斯兰教传统和保守势力的反对。从历史上来看,奥斯曼帝国三大构成要素,即最高世俗统治者素丹与“安拉”在人间的代表哈里发的合二为一、构成帝国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乌莱玛”和伊斯兰教法,由此可以看出,土耳其具有根深蒂固的伊斯兰传统,并且聚集了强大的宗教势力。改革伊始,当西方化和世俗化的改革措施触及到封建宗教上层人物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时候,便遭到他们的强烈抗议,改革始终在谨小慎微中进行。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化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传统性相对减弱、现代性相对增强的过程。从共和国之前改革的总趋势来看,伊斯兰教对土耳其政治的影响呈减弱发展,但土耳其政治中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的二元特征始终存在着的。从形式上来看伊斯兰教似乎在逐渐退出土耳其政治,但从穆斯林的心理上而言它却是无法抹煞的,共和国成立后城市乌莱玛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但农村和小城镇的乌莱玛仍旧保持着原来的信仰。尤其是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不断深化的世俗化的刺激、土耳其越来越远离伊斯兰阵营而又并没有真正被西方所接纳的现实、社会转型导致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等原因,引起伊斯兰势力的强烈不满。战后不久,国内就兴起了要求返回伊斯兰传统社会的党派民族行动党和民族秩序党,还掀起了各种伊斯兰运动,最有影响力的是萨义德·诺斯运动,其倡导者萨义德·诺斯发表《光明使徒书》,号召人们进行宗教自救,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政治现代化的步伐。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民族拯救党不仅要求重返伊斯兰社会,更要求伊斯兰教在政治上重树权威,该党敌视资本主义而希望建立一个道德与公正的社会。上述因素加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膨胀起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使得土耳其国内掀起一股伊斯兰复兴的潮流,并发展为一支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同时还吸引了大批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居民以及青年学生的加入。1995年亲伊斯兰的繁荣党获得了21.38%的选票,1999年大选中,美德党(原繁荣党)仍位居第三大党,其政治影响仍未消减。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土耳其现存政治体系体现了较

大程度的民主和自由度,各伊斯兰政党以不同的身份和方式参与政治,增加了政治的民主气氛,尤其是作为伊斯兰第一大党的繁荣党其手段也是较为温和的,但不能因此就排除伊斯兰因素对政治现代化的消极影响,伊斯兰政党仍将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对政治的冲击也具有一定的起伏性和周期性,增加了土耳其政治发展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此外,经济发展状况对土耳其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政治现代化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二者相依相辅,需要协调一致的发展。共和国成立之初,并没有完全剔除旧帝国的特征,“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仍大多是旧面孔……农民们看到,围绕在他周围的人似乎仍是他们过去的领导人:乌里玛的成员、官员和军人。大多数朴素的公民很难感到这是一个新国家。”^[5]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方法也被沿用下来,尤其在13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土耳其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凯末尔政府致力于发展现代工业,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低,技术设备落后,资本利用率低,国家对私人企业也控制过严,农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产业结构没有得到多大改观。1950年民主党执政,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得到较大发展,但也因此引起了新的混乱。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债务问题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又一难题。根据1926年洛桑仲裁委员会的决定,土耳其需偿付4亿美元的外债,另外还要承担900多万美元的内债,而政府有限的收入难以应付如此繁重的债务。1950~1960年是共和国建立以来借外债次数最多的时期,外债比过去增加了10倍,政府的负担尤为加重。在“三·五”计划建设期间,土耳其财政仍然入不敷出,国际收支仍处于逆差境地。截止1990年,土耳其的债务仍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6%。加之1973年以后,在石油价格的剧烈上涨和西方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干扰下,土耳其的外贸赤字持续上升,工业及其整个经济的发展都陷入较为严重的困境。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土耳其的经济呈上升趋势,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发展尚不充分,现代经济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经济上的不稳定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政治平等和政治民主的思想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滞。

除上述不利因素外,土耳其国内的军队地位长期居高不下、教派之间的纷争以及长期存在的希族、土族政治权益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治现代化进程。由此很多学者对土耳其的政治前景表示出

忧虑,甚至开始怀疑世俗化与西方化的道路是否适合于土耳其,伊斯兰教或军政府控制政治的历史是否会卷土重来,土耳其能否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能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体系。这一切说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任重而道远,如何均衡各种权力,如何应对变化多端的严峻挑战是摆在土耳其当局面前最紧迫的任务。但可以肯定土耳其未来政治的发展仍将以世俗主义为基本原则,世俗与宗教的二元对立也仍将是土耳其社会的基本特征。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土耳其是一个充满了对立和否定的统一体,是一个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国家,^[8]它一方面努力促进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而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将坚持“欧洲定位观”,依然沿袭西方化和世俗化的改革道路。作为中东发展现代化的“个案”,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发展还有待于长期的实践来检验。

[责任编辑 杨彬智]

(上接第 90 页)

的形成,思想上又助长了穆斯林中的宗派主义倾向。曾经有人很早就指出这一不足,并号召由权威人士制定出一项各地法官都应遵照执行的法律,即制定法律通典,可惜未能得到响应^[3]。只是到 18 世纪以后,西方法律随殖民主义侵入东方,穆斯林世界才被迫实行法律的分工,制定各部门法律通典^[8]。

当然,伊斯兰法的衰落也有客观原因。阿拔斯王朝中期,穆斯林帝国即出现分裂。各地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交通阻塞,经济萧条,生产破坏,文化事业发展失去物质保障和安定的环境。伊斯兰法学家面对现实困境,消极低沉。许多学者转向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或者干脆隐居避世,法学研究活动进一步与现实分离,伊斯兰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伊斯兰法在经过长期衰落僵滞之后,到 20 世纪又出现复兴,主要标志是“创制大门”重新打开。近代,尤其自 19 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出于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维护伊斯兰教纯洁和尊严的立场,开始深刻的自我反省,“创制大门”是否关闭的争论重新出现。学者们认识到,为了使伊斯兰重新焕发活力,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必须重新开启“创制大门”,对经训做出合乎现代精神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从事穆斯林国家的立法工作。这一活动在奥斯曼帝国后期开始缓慢启动,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四大法学派别之间的壁垒有所打破^[8],西方立法方式(比如民法典编纂)被逐渐采用。然而总的来说,这时开启“创制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2] 吴云贵. 当代伊斯兰教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3] 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4] 彭树智. 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 [5] 谢立中, 孙立平. 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6] 伯纳德·刘易斯.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7] 杨鲁萍. 全球化与中东政治制度民主化[J]. 西亚非洲, 2001, (6): 37—40.
- [8]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大门”已经无济于事,无法挽救穆斯林世界免遭西方殖民侵略和压迫。进入 20 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赢得独立。这时候伊斯兰法学才真正获得独立思考的机会,创制在伊斯兰法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成为穆斯林世界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有力武器,伊斯兰法学藉此而重新显示出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 [1] [埃及] 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2] 马坚译. 古兰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3] [埃及] 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三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4] 马明贤. 伊智提哈德——伊斯兰法的创制[J].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 (3): 80—83.
- [5] 高鸿钧. 伊斯兰法: 传统与现代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6] 丁俊. 伊斯兰文化巡礼[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 [7] 吴云贵.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0.
- [8] Oussama Arabi, Contract Stipulations in Islamic Law; The Ottoman Majalla and Ibn Taymiyya[Z]. *Middle East Studies*, 1998, (30).

[责任编辑 杨彬智]